

新中国体育课程标准的演化特征与时代价值

秦国阳¹, 程卫波²

(1. 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2. 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体育课程标准不仅是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的指导性、法规性纲领, 也是见证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及变革的历史线索。研究认为: 经过从“形成与改造”到“调整与恢复”, 再到“创新与深化”等阶段的嬗变, 我国体育课程标准呈现出以下演化特征: (1) 课程理念从“社会本位”到“学科本位”, 再到“学生本位”; (2) 课程目标从“增强体质、劳动卫国”到“三基”, 再到“三维目标、核心素养”; (3) 课程内容从“技术化、统一性”到“基础化、灵活性”, 再到“结构化、综合性”; (4) 课程实施从“指令执行”到“灵活创生”, 再到“因材施教”; (5) 课程评价从“体质检测”到“能力评估”, 再到“素养评价”。体育课程标准涵括以下时代价值: (1) 课程标准内涵立意呈现出从“社会立场”到“学科立场”, 再到“教育立场”的流变; (2) 课程标准设计思维实现了从“确定性思维”到“灵活性思维”, 再到“综合性思维”的转变; (3) 课程标准内在逻辑表现出从“体质导向”到“内容主导”, 再到“三位一体、课程育人”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学校体育; 体育课程标准; 课程改革; 体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 G80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2-0105-07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the new China

QIN Guoyang¹, CHENG Weibo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2.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not only a guiding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ese schools, but also a historical clue to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fter undergoing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adjustment and restoration”, and then to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China'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1) The curriculum concept has shifted from “social standard” to “subject standard”, and then to “student standard”; (2)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range from “enhancing physical fitness and safeguarding the country through labor” to “three basics”, and then to “three-dimensional goals and core competencies”; (3) the course content ranges from “technical and unified” to “foundational and flexible”, and then to “structured and comprehensive”; (4)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has shifted from “instruction execution” to “flexible creation”, and then to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5) course evaluation goes from “physical fitness testing” to “ability assessment”, and then to “literacy evaluati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include the following contemporary values: (1) The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has shown a change from a “social stance” to a “disciplinary stance”, and then to an “educational stance”; (2)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design thinking has achiev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deterministic thinking” to “flexible thinking”, and then to “comprehensive thinking”; (3) the inherent logic of

收稿日期: 2023-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72)。

作者简介: 秦国阳(1998-),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学。E-mail: 1127303178@qq.com 通信作者: 程卫波

curriculum standards shows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physique oriented” to “content oriented”, and then to “trinity, curriculum education”.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curriculum reform;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体育课程标准是体育教材编写、教学、课程实施及评价的直接依据,对学校体育的整体发展起着纲领性的规范效用。为落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诉求,解决当前体育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顺应国际体育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以“核心素养”和“课程育人”为指导思想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成为新时代课程改革最鲜明的风向标^[1]。回溯之前 8 次体育课程改革,从体育教学大纲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其内涵不断得到充盈和完善。然而,体育课程标准的与时俱进仍无法回避历时性的文化价值选择和共时性的中西文化价值冲突等诸多挑战。在此意义上,通过对体育课程标准演化历程的爬梳,系统剖析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目标、内容、实施及评价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旨在为推动新时代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不断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1 以史为证:体育课程标准的嬗变回眸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体育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业。在此时代背景下,体育课程标准历经 70 余年的激荡、调试和完善,划出一道隽永的演化之痕。

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课程重建与本土探索:形成与改造阶段(1949—1976年)

对于 1949—1976 年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标准建设,应当主动跳出单一历史事件的局限,将其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和反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把握体育课程标准的发展脉络。新中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由于缺乏统一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体育课程也处于教师会什么就教什么或放羊式教学的状态^[2]。1950 年在以苏为师的时代情势下,《小学、中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的颁布统一了体育课程的教学秩序^{[3][2]}。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1956 年后体育课程标准逐渐进入本土化初创阶段^{[3][7]}。不止如此,由于之后几年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等事件的相继发生,学校体育也随之出现“大开大合”的趋势。“教育革命”中相当多的学校开始以劳动、军训替代体育,学校体育教学秩序基本处于“无纲无本”的无序状态,教学质量几近滑落谷底。由此,对于 1949—1976 年期间的中国学

校体育,既要对其“全盘苏化、自主探索以及无纲无本”等阶段进行主动反思,也要对其当时所置身的国际大环境有一个比较全面透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从新中国成立初始到改革开放的体育课程标准,如何从向苏联学习被迫转向自主探索,如何推动体育教学大纲及教材从无到有和有到无等背后的机理有一个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全面深入掌握,进而对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后)体育课程标准一系列文件出台或颁布的理解不至于出现时间跳跃和思想断裂。

1.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课程复生和思想觉醒:调整与改革阶段(1977—1999年)

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日益好转和国内政治的拨乱反正,学校体育尝试步入正常发展轨道。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方针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1979 年“扬州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应摒弃“劳动体育”的传统思想,确立“体质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的中心指导地位^[4]。尽管 1982 年的烟台会议在体育观(大体育观和真义体育观)上出现一定分歧,但在注重增强学生体质方面两者其实都还是体质教育思想的某种拓展和延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国家发展和人民期盼的高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这一时期在体育课程建设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提升。1985 年“素质教育”理念出台,随后“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和“成功体育”等体育思想开始不断涌现。不仅如此,1986 年九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1987 年《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行为的关注和培养^{[3][15]}、1988 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初审稿)》对课内外体育活动相结合的着重强调^{[3][58]}、1992 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对“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主导、学生是体育教学主体”教学理念的初步明确^{[3][22]},以及 1996 年《“体育两类课程整体教学改革”的方案》对“以技术、技能为主”与“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之间教学矛盾的有效解决^[5],无不表明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理念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之后,学生身心发展逐渐受到重视,体育课程的

人文价值也开始得到更多关注^[6]。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课程突破和本土实践:创新与深化阶段(2000年至今)

21世纪伊始,面对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和国际间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政治、经济及教育各领域的深化改革也与时俱进。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就针对以前体育教学大纲中主要以掌握知识技能为主要价值导向的不足,提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确定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5个领域目标,重新划分学段,将发展性评价方式纳入评价体系,并采用“先立后破,先实验后推广”的思路,标志着体育第八次课标启动试点阶段的开始^[7]。可以说,相较于体育教学大纲着重于对体育学科知识和技能的选择,受欧美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则更加强调从“学科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人本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学校体育教学中“体育知识技能教学至上”等教学取向的单向度发展。2011年在结合10年来一线教师及教研员实践经验及相关专家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正式颁布并推广,标志着体育课程标准进入初步完善阶段。在此基础上,2014年教育部又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在此文件中明确指出构建各学段核心素养培养体系的目标,确立“核心素养”在课程体系中的“DNA”或纲领的地位^[8]。2022年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更是将培养核心素养的要求下沉到义务教育阶段,并在结合“三有”——“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以及“三面”——“正确价值观、关键能力、必备品格”的基础上,形成“三有+三面+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体系^[9]。不难看出,进入21世纪后,我国体育课程标准在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及教育理念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其核心主旨从“知识导向、知识本位”转向“素养导向、育人本位”,进而在本质上扭转以前体育课程标准“重升学轻发展”“重考试轻素养”等弊病,使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深化、在深化中完善。

2 由史入思:体育课程标准的演化特征

回顾体育课程标准的演化理路,既有对以往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积淀与继承,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和突破,其发展逻辑是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体育课程的理

念、目标、内容、实施及评价等方面,均因顺应不同阶段社会发展而展现出其独有的时代性。

2.1 课程理念:从“社会本位”到“学科本位”,再到“学生本位”

课程理念是课程标准发展或变革的“定位”,是对课程与教学基本问题的看法或观点,也是体育课程改革的思想依据和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倒逼我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体现在学校体育课程上就是,参照苏联的劳卫制,以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为中心,以凯洛夫、凯里舍夫为代表的教育学和体育教育理论做为当时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更有甚者,在抗美援朝等复杂时代背景下,以劳动和军训代替体育课等政治教育占主导的现象均表现出体育课以“社会为中心”的工具性倾向。可喜的是,1979年扬州会议之后学校体育思想开始纠偏,“增强学生体质”和“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成为新的风向标。随着体质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注重学生身体改造和体育知识、技能灌输的“学科本位”思想渐入人心。不仅如此,在1985年后其强调终身体育、快乐体育等理念的学校体育影响力也开始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后,强调在学校教育中“要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健康第一”指导思想更是深入人心^[10],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身心和谐发展开始真正得到重视。之后随着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体育课程育人价值得到进一步开发,尤其最近几年体育学术界和体育一线教师从不同维度对运动强度划分标准的自由争论,更是彰显出体育课程性质从“工具”属性真正转向育人属性^[11]。

2.2 课程目标:从“增强体质、劳动卫国”到“三基”,再到“三维目标、核心素养”

课程目标是体育课程的核心要素,是评价课程有效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体育课程的构建及落实起着重要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国内外政治形势,1950年暂行国家课程标准确定“培养学生健康技能、健美体格,打好为人民、为国家建设战斗而服务的体力基础”的体育课程目标。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开始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随后在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时代的挟裹下,我国学校体育基本上被迫中断或停止了10余年之久。时间来到1978年,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学校体育推出《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在草案中确定“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三基”课程目标^[12]。之后随着体育

教学大纲的不断修订,“三基”深度融入体育课程的素质教育思想中,并对体育课程的素质教育实践教学产生深远影响^[12]。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伊始,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更是确定“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从之前单纯关注结论性知识和技能,加入对过程性和价值性知识和技能的聚焦。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开始转向“人本主义”,但三维目标的落实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仍有一定距离^[13]。由此,2017 年和 2022 年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更进一步地回应党和国家对育人和素养的诉求,在三维目标和素质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将体育教学目标精细化和系统化,提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即“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将人们的关注点从体育的三维知识及技能落实转向体育核心素养的养成,坐实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2.3 课程内容:从“技术化、统一性”到“基础化、灵活性”,再到“结构化、综合性”

课程内容作为课程理念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主要途径,也是教学实践的重要依据。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因应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引进苏联的体育教材体系以快速恢复体育秩序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唯一选择。在这个教材体系中潜含着“国定制”“一纲一本”的高度统一的体育课程及教材管理制度。1950 年的体育课程暂行标准、1956 年的体育教学大纲、1958 年的“大办民兵师”,以及 1959 年开始的“四红”“双红”运动^[14],尽管其内容的技术化规定有所差异或特指,但为生产、国防建设服务以及为国争光的宗旨从未撼动过。1978 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打破之前以生产、国防建设服务以及运动竞赛为中心的体系,强调体育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诉求,并加入体育基本知识的课时安排,此后,“宜少宜简”的灵活性教学内容开始得到认同与推崇。尤其在 1985 年素质教育思想被提出后,体育教学大纲对其教学内容中的体育知识和实践更是再三强调。进入 21 世纪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更是围绕过程性、价值性知识及技能对教学内容进行结构化构建,避免教学内容的碎片化,确立以核心素养为主轴的内容体系,进而推动体育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发展。

2.4 课程实施:从“指令执行”到“灵活创生”,再到“因材施教”

课程实施是实现预期教育结果的手段,是课程改革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伊

始,因苏联体育教学模式的主客观影响,体育课程实施中教师、课程和教科书成为其中心,教师在体育课堂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在之后 20 多年的体育课程实施中,“高度统一、指令执行”的模式一直是规范体育教学秩序的不二选择。20 世纪 80 年代后,“高度统一、指令执行”的课程实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教材“审定制”“一纲多本”以及“多纲多本”的探索成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课程推行方式^[15]。无独有偶,1987 年体育教学大纲在加大选用教材比重的基础上,给予体育教师结合实际条件选择教材的弹性和权力。与此同时,学生的主体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体育课程实施及设计从注重学生体质提升和技能掌握开始转向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及身心和谐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的提出给予地方和学校制定课程实施方案更大自主权,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个体差异,关注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以及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方式的提倡,更是给予体育教师根据课程目标因材施教自主选取教学内容的权力。体育课程实施的重心顺次进入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良性轨道。

2.5 课程评价:从“体质检测”到“能力评估”,再到“素养评价”

课程评价是通过系统收集课程信息,采用一定的标准对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客观判断。新中国成立初期,1956 年体育教大纲就提出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情况进行考核,1958 年“体育大跃进”阶段出现的“四红”“双红”运动以“劳卫制”为标准,将体育课程评价推向极端体质化。在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程度修正后,从 1964 年开始武汉、辽宁等多地学校将对比每一学年初和学年末学生体质测试与健康检查的结果作为体育成绩考核办法。1976 年体育教学秩序逐渐恢复,1978 年体育教学大纲开始详细规定体育课程的考核内容及标准,将跑、跳、投、基本体操和技巧 5 类身体素质项目作为其考核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研究的重点。受此影响,1987 年体育教学大纲对课程评价顺势进行调整,改变之前只强调学生体质及运动素质的达标测试,采用包括学习态度、理论知识、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运动技能和技巧等维度的综合考核方法,逐步实现课程评价从“体质检测”向“能力评估”的转变。新世纪伊始,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更是将学生体能、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等维度纳入体育课程评价范围,采用终结性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推动学生参与自评或互评^[16]。在此基础上,2011 年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进一步将定

性与定量、形成性与终结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相结合的多维度综合评价确立为其评价标准。2017年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审时度势地提出要培育体育的核心素养,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使得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的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得到进一步提升。简言之,体育课程评价从单位时间内对学生体质及身体素质提升效果的检测,到体育知识与技能运用的实践能力评估,再到课程育人价值的核心素养评价,评价重点实现从“教学效率”到“教学效益”的跃迁。

3 向史而新:体育课程标准的时代价值

体育课程标准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我国体育课程及教学发展的风向标,通过对其演化理路及特征的回溯与归结,以窥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课程及教学发展的基本样貌。在此基础上,结合各阶段我国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对各时期体育课程标准的形成原因和底层逻辑进行推本溯源,并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时代价值。以“鉴古”而“知今”,准确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核心要义,才能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之时,以史为鉴推动我国体育课程及教学的高质量发展,以借鉴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的新思维开启新征程,向世界传唱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3.1 课程标准内涵立意的流变:从“社会立场”到“学科立场”,再到“教育立场”

本杰明·莱文^[17]在《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中指出:“任何关于教育政策的探讨都应从相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出发。”体育教育及课程标准的变革当然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重建秩序、稳定局面成为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审时度势地提出“增强人民体质”、“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等口号,暗示在一切以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为终极目标的诉求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成为当时我国体育课程理念及立意的首要选择。需要指出的是,1952年后我国学校体育以苏为师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具有浓厚苏联色彩的、以“社会立场”为内涵的教学大纲,以及1958年后被全面脱苏导致体育课程的极端化“社会本位”——“四红”“双红”“以军代体、以劳代体”等运动或现象,有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1977年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逐步好转,我国领导人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整个国家及社会发展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教育功能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体现在学校体育上就是其国

防功能逐渐弱化,“体育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三基”课程目标逐渐强化,体育课程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渐次实现其“学科性”属性。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新时代后,国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是超越“身体健康”“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技能”等一维层面,具有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体育人才培养逐渐成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核心。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理念经历从“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再到“综合素质、核心素养的培育、促进全面发展”的跃迁,反映出学校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从注重外在功能和工具理性向内在本质与价值理性的转变,体现党对体育课程改革的人文关怀,反映党在体育教育事业上的高瞻远瞩,充分彰显党和国家在特定时期对体育教育美好发展的时代诉求。

3.2 课程标准设计思维的转变:从“确定性思维”到“灵活性思维”,再到“综合性思维”

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论述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她)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实现其丰富个性。”这种对人全面发展的定义,指引着体育课程设计思维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受到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等地缘政治的影响,用“教学大纲”替代民国时期的“课程标准”就成了当时的不二选择。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苏联体育“一纲一本”、高度统一的“确定性思维”教学大纲的指导下,构建出劳卫制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1958年后在各个领域走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成为唯一选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劳动替代体育教学内容再次成为主流,尤其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以后,保卫祖国、支持国防当仁不让地成为学校体育的首要目标,队列、投掷手榴弹、跨越障碍、民兵训练以及体能训练等又迫不得已地成为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这里必须申明的是,此种境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68年后随着世界范围内“革命”的急遽退潮,中美对立的情势开始松动,尤其随着华沙会谈、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的渐次推进,重新恢复学校体育教学秩序、调整教学内容以适应我国轻工业建设的需要就成为学校体育的当务之急。在1977年改革开放后,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隆重开启。但由于之前的内忧外困和试错代价,导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出现极大下滑,难以满足西方引进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项目发展需求。因此,1979年扬州会议在恢复体育教学秩序

的基础上,将体育教材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相结合,确定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才是体育课程的主要旨归。自此,我国体育课程设计思维不再停留在苏式的“确定性思维”,而是转向具有西方自由主义特色的“灵活性思维”,学生个体发展受到重视,快乐体育、终身体育等体育思想也逐渐引入国内。体育教学大纲及教材的顶层设计也转向“审定制”和“一纲多本”,体育课程实施及内容灵活性得到进一步解放。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等思想的滥觞,体育课程标准正式替代体育教学大纲,标志着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教学”体系正式向欧美的体育“课程”体系加速转型。体育课程标准的制定不再纠结于体育知识与技能的多与少、难与易,而是通过目标引领教学内容,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并构建三级体育课程管理体系,给予体育教师、地方和学校更大自主权。不仅如此,近几年伴随着我国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调整和转型,我国对人才的需求从 21 世纪伊始适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身体健康”“具有基本知识和技能”,向实现科技突破的高端制造业的有创新能力的“综合素养”要求转变,同时着力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问题也相应提出。我国体育课程的设计思维顺势从“灵活性思维”转向“综合性思维”。在体育课程中为促进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真正形成与发展,体育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引领”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体育学练,体育教学实施也更加注重因材施教的重要性。这些改变都是党和国家在充分认知自身发展状况下的主动探索,是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道路上的自我建构,其立意深远、影响巨大,为我国学校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3.3 课程标准内在逻辑的变化:从“体质导向”到“内容主导”,再到“三位一体,课程育人”

1894 年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提到:“应当把对青年人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看做是短期兵役的一种补救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可见恩格斯深刻认识到体育对提高人身体素质以及强健青少年体魄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战争导致我国青少年生长发育不良、体格缺陷等健康水平堪忧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而全面借鉴苏联构建的国家“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就是其应对的最重要举措。然而苏共二十大后,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学校体育道路则成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新路径,“四红”和“双红”就是“体质导向”极端体育教学评价标准的生动写照。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逐渐回

暖,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受此影响,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也不再仅仅停留于扬州会议的重新恢复,而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开始积极接触新体育教育思想,出现快乐体育、终身体育、成功体育和整体效益论等多种学校体育思想,形成多元并立的学校体育思想格局^[18]。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的关注点也从只关注学生身体体质的一维身体健康观转向身心并重的二维身心健康观。体育课程评价也相应发生较大改变,从以学生身体素质的达标和测评为重点,转向以学习态度、理论知识、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运动技能等“内容主导”的维度。不仅如此,随着 21 世纪后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我国学校体育教学论开始真正向欧美体育课程论转向,生成具有浓厚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体育课程标准;提出“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重塑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等多维健康观,建立更加注重学生个体发展和成长过程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我国学校体育更是顺势而为,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形成以“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为主轴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将过程性评价贯穿于整个体育学习过程,助力学校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课程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综合因素影响下生成具有从“体质导向”到“内容主导”,再到“三位一体,课程育人”等不同特点的体育课程教学观念及评价标准,对于学生健康水平的关注也分别形成关注学生体质的一维身体健康观、身心并重的二维身心健康观、以及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等多维全面发展健康观。这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我国体育课程标准发展与改革的内在逻辑始终是与时代发展同步调,与体育强国同脉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命运。

体育课程标准是学校体育教学的法规性与指导性课程文件,也是学校体育思想及理念的集中反映。对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演化特征和时代价值进行底层逻辑追问,发现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精神内核自新中国成立伊始经历从手段到目的、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演化之路。尽管如此,也深知体育课程标准的改革只是一项旅程,而不是一种蓝图,变革终究是非直线的,充满着不确定性^[19]。尤其在当下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进一步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的战略定位,体育课程标准如何应对和适应复杂、严峻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助力,而且还必须在结合

时代特点和需求的基础上,遵循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的底层逻辑不断完善及深化,以推动我国学校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季浏.《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突出的重点与主要变化[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10):54-59.
- [2] 陈长洲,王红英,项贤林.新中国成立70年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演变及反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6):85-94.
- [3]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体育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2-221.
- [4] 邵天逸,王倩,吴勉.体质教育思想脉络梳理、问题廓清与价值确认[J].体育学刊,2023,30(1):7-13.
- [5] 李兴艳.浅谈我国学校体育两类课程整体改革[J].湖北体育科技,1999(1):81-83.
- [6] 曲宗湖.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校体育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学校体育,2019,31(10):6-9.
- [7] 彭泽平,李礼,罗珣.新中国70年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5):373-380.
- [8] 薛昭铭,高升,马德浩.落实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教学的理论审思、逻辑起点与路径建议[J].体育学刊,2023,30(4):81-89.
- [9] 张传燧,左鹏.新时代课程育人:价值、目标及方式——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的理解与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10):20-27.
- [10] 季浏.坚持“三个导向”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析[J].体育学刊,2022,29(3):1-7.
- [11] 熊文.质疑与辨正:学校体育健康追求的强度关联——基于体育课程教学特定运动强度的审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1):86-98.
- [12] 邵天逸.学校体育课程“三基”教学的思想流变历程、学理阐释与研究聚焦[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34(4):413-420.
- [13] 余文森,龙安邦.论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的教育学意义[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6):4-13.
- [14] 王华倬.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3.
- [15] 张文鹏.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与改革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 [16] 刘皓晖,孙铭珠,袁志欢,等.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大评价提出缘由、要素解析与推进方略[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35(4):381-390.
- [17] BENJAMIN L. 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4.
- [18] 古雅辉,刘昕.从规训到关怀: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中身体观的演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6):140-148.
- [19] 郝德永.超越左与右:课程改革的第三条道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78.

